

巴克禮《廈英大辭典補編》及 杜典以後的辭字典

書名：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Rev. Carstairs Douglas, M.A. LL. D]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補編)

作者：Rev. Tomas Barclay, M.A., D.D.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學博士巴克禮牧師)

出版者：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Tainan, Formosa (台灣台南：英國長老教會)

出版年代：1923

提要

Tomas Barclay，漢名巴克禮，英國長老教會牧師，一生奉獻於台灣傳教。創刊《台灣府城教會報》，替杜嘉德《廈英大辭典》作補編，重譯新舊約聖經，對閩南語白話字的推廣，閩南語的研究，貢獻厥偉。本篇以巴克禮及其補編為主軸，兼述杜典以後的辭字典及其作者。

1. 巴克禮小傳

巴克禮(Tomas Barclay 1849-1935) 1849年11月21日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市，巴克禮少年時代聰穎過人。大學畢業後入神學院，在英國名物理學者Lord Kelvin的研究室研究電氣學(當時電氣學是尖端科學)，並得在英國皇家學院發表研究論文，因而名列英國人名辭典(Who's Who)①。

1873年格拉斯哥神學院畢業後，又往德國來比錫大學遊學六個月。同年杜嘉德回英國休假，排印《廈英大辭典》，巴克禮見到神



巴克禮牧師遺像

學院院長喬治杜嘉德(George Douglas)的弟弟杜嘉德牧師(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牧師勸他放棄進修，來台傳教，在猶豫了一陣之後，決心來台。

1874年抵台，旋轉廈門學習閩南話。次年6月5日返台。最初在打狗(高雄)旗後李床(Hugh Ritchie)牧師(台灣長老教會第一任牧師)的神學校教書，當時學生只有3名。而長老會主要信徒在府城(台南)。1876年6月29日府城長老會府城大學創立，即今台南神學院前身。1877年旗後神學校結束，巴克禮帶著學生併到府城大學。同年杜嘉德死於霍亂。

1881年巴克禮回英國休假，募得一台印刷機，巴克禮親身進一家印刷廠學印刷術，以便回台印刷傳教文字之用。1883年10月10日巴克禮返回廈門。1884年1月4日返台。5月24日創立新樓公報社，印刷廠開工。1885年6月12日創羅馬字《台灣府城教會報》，這個印刷廠真正派上用場。

1884年9月巴克禮得瘧疾，赴汕頭養病，適逢中法戰爭，法軍佔領台灣。因此遲至次年4月15日才返台，任府城大學校長。他這任校長做到1925年，前後共四十一年。1885年巴克禮創府城中學，即長榮長老教會中學的前身。

1892年巴克禮44歲與一名護士結婚。1908年巴克禮夫婦返回英國渡假，1909年返

回上海時，巴克禮夫人病死。7月7日巴克禮隻身返台。在巴克禮87歲的生涯中，真正過著夫妻生活的日子不過17年，其餘都是單身。

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北部的唐景崧等建立台灣民主國，旋即逃亡。劉永福的黑旗軍，邊打邊退，退到台南城，被乃木將軍所包圍。10月底潛回大陸。

府城台南頓時成無政府狀態，盜賊乘亂打劫，商人爲了自救，乃懇請巴克禮出城去迎日軍進城維持秩序。10月26日，巴克禮與隨同十四人往見乃木將軍，次日迎日軍進城。時日軍未知劉永福已逃，正準備砲轟台南城。巴克禮之舉救了台南城，因而獲日政府勳五等雙光旭日章，並獲中國政府卷軸致謝②。

巴克禮晚年始勤於著作，他的重要業績有二：一是替《廈英大辭典》作補編，一是翻譯新舊約聖經。

1913年，即巴克禮同僚甘爲霖牧師在橫濱刊印《廈門音新字典》的同年，巴克禮受台灣、廈門兩岸牧師的請求開始替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作補編。經過將近十年，即1922年，巴克禮回英國渡假返台之後，帶著剛從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回台不久的年輕牧師楊士養一起到上海監印《廈英大辭典補編》③，1923年出版。

關於聖經漢譯，麥都思等人曾於1852年及1853年譯成所謂代表譯本(Delegate Version)新舊約聖經。這個譯本定稿時曾經過一些漢文先生修改過，是很優雅的漢文(文言文)譯本。其後各地的方言譯本，乃至日文譯本都是根據這個譯本轉譯的。閩南語譯文，自1853年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牧師據代表譯本廈譯《路得個冊》以後，陸續有1863年胡理敏廈譯《馬可福音傳》；1867年施敦力約翰廈譯《使徒行傳》；

1868年打馬字廈譯《路加福音書》；施敦力約翰廈譯《彼得前後書》、《啓示錄》；1870年打馬字廈譯《約翰書》一、二、三；1871年羅啻廈譯《約翰福音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1872年打馬字譯《馬太福音書》……全部用廈門話教會羅馬字寫成。1873年在馬雅各醫生的監督下，全本廈譯《新約聖經》終於在英國Glasgow出版了。1884年全本廈譯《舊約聖經》也在馬雅各醫師的監督下，在倫敦出版。

但是這套廈譯聖經所根據的代表譯本雖然文字雅馴，却不甚忠於原文，加上廈譯本誤譯之處頗多，台廈的牧師們覺得有重新根據原文直接譯爲廈門話的必要。

1884年中法戰爭，法國佔領台灣。台廈兩地的牧師受到領事館的忠告暫時避難廈門。宣教師得到這個機會共議重譯聖經的事。起初決議由各地牧師分擔，但譯成出版之後發覺良莠不齊，體例不一。

1913年廈門的牧師們檢討失敗，決定全權委託巴克禮重譯聖經，同時也決議由巴克禮增補《廈英大辭典》。時巴克禮六十八歲。

於是巴克禮遷居廈門，請了三名廈語教師當顧問，6月11日起，開始直接由希臘文原文廈譯《新約》聖經。兩年之後譯完，送往橫濱福音印刷所排印，1916年5月28日正式出版。

新譯本得到各地好評，「雅」雖略遜一籌，「信、達」却做到了。1919年巴克禮以這個譯本榮獲Glasgow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1925年巴克禮再受委託翻譯《舊約》。當時巴克禮已八十歲，仍然無法辭謝。於是巴克禮辭去台南神學院校長職回英休假兩年之後，1927年直接到廈門着手翻譯《舊約》的工作。巴克禮直接由希伯來文譯成廈門話，偶而參考英文譯本，漢文顧問參考新譯的漢

文譯本。1930年12月30日，《舊約》新廈譯本終於順利完成了。

1931年巴克禮抱著新譯本前往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1932年1月排到1047頁時，上海事變發生，印刷廠遭日機轟炸，所有原稿、鉛字都付諸祝融。當時已經84歲的巴克禮可謂萬念俱灰。所幸巴克禮手頭上還保存著一份抄本。於是重返台灣，1932年10月，巴克禮趁事變結束之後，立即趕赴上海重印。1933年8月4日全本《舊約》廈譯聖經印刷完成，巴克禮返台。同年12月25日裝訂完成的二十本舊約譯本，像聖誕禮物一般，寄達台南巴克禮的手中④。

巴克禮在八十餘歲的晚年翻譯舊約時，日夜祈禱上帝讓他完成翻譯工作。果然，當《舊約》完成之後的1935年2月，巴克禮因中風而病倒床上。

1935年10月15日是巴克禮來台傳教六十週年紀念日，當信徒們決定盛大慶祝的前十天，10月5日上午12時2分，巴克禮來不及參加盛會便辭世了。

2. 巴克禮與教會羅馬字

基督新教為了傳教的目的，非常注重當地信徒母語的研究，替各國語言或方言創制羅馬字拼音文字，以便翻譯聖經及傳教之用。這個傳統自宗教革命以來便如此。和馬丁路德同稱宗教革命的領袖厄拉斯姆斯就曾說過：

「所有信徒都應該用他們的母語讀聖經。爲了讓那些目不識丁的農夫，拿著鋤頭想起聖經的句子，掘墓的土工仔一面勞動一面從聖經的話得到慰藉，聖經一定要譯成他們的母語。」⑤

散佈於全世界的傳教士學習各地語言、編字典、教科書、譯聖經、寫傳教文字，爲人類留下寶貴的語文遺產，莫不是由於這個

信念。由此看來，巴克禮編《廈英大辭典補編》、翻譯新舊約聖經，雖然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却不是很特殊的貢獻。

西洋傳教士替各地製訂的羅馬字後來往往變成正式文字。有時候甚至取代傳統的文字變成一種新文字。法國佔領安南之後以羅馬字取代傳統漢字與字喃並用的安南文便是一例。不過在原來使用漢字而未淪爲西方殖民地的中國、朝鮮、日本，羅馬字的推行便極爲困難。羅馬字頂多只是少數基督教徒爲信教目的而採用的輔助文字而已。

但即使是這種有限的功能，各地推行的成敗極不相同。台灣地區可以說是教會羅馬字推行最爲成功的地區。台灣老輩的長老會信徒幾乎人人能讀教會羅馬字，教堂裏，信徒們一起閱讀羅馬字聖經，一起合唱讚美詩，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夫，都能夠用羅馬字寫信給遠方的兒子，透過羅馬字，知道世界上更多的事情，這種成績無疑地應歸功於巴克禮的提倡。萬榮華在他的大著《Barclay of Formosa》中，記錄巴克禮的話說：

「從我初抵台灣，就確信三件事，至今歷五十年仍堅信不移。第一、若要健全而有活力的教會，每一位信徒不分男女都要研讀聖經；第二、這個目標使用漢字是達不到的；第三、使用羅馬拼音的白話字可達成這個目標。白話字很適合婦女、兒童及未受教育的人們使用；讀書人只用漢字，就是對白話字的輕視。因此我決心以身作則，用白話字代替漢字。我一生中只有一次用漢字聖經講道，我爲那一次感到遺憾。我當然知道，只用白話字會被人誤爲不學無術，但想到可能帶來的利益，我就不在乎了。」⑥

巴克禮實際推動白話字最重要的工具除了白話字聖經、聖詩的翻譯之外，當推白話

字教會報的創刊。1885年7月巴克禮創刊《台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 Hū-siāⁿ Kàu-hōe pō),即《台灣教會公報》的前身。這個羅馬字報紙一直延續到1969年3月第1049 + 1050合刊。前後共84年之久。

《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詞很顯然出自巴克禮之手。詞曰：

「你們自己讀聖經，會受聖靈感動，雖然沒有人講道給你們聽，仍然會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惜漢字很難學，會讀的人少，因此我們另行設法，以白話字來印書，使你們較易看得懂。我們最近在府城設備了一座印刷機，可印這種讀物。希望衆人要努力學習白話字，以後我們若印什麼書，你們都可看得懂。不要以為看得懂漢字就可以不必學白話字，也不要看輕它，以為是小孩的玩意。兩種字都有用處，不過因為這種白話字易學易懂，因此人必須先學它，以後如再讀漢字更妙。但是要先學白話字，以免因為不懂白話字而讀不懂我們以後所印的。勸你們衆人、信徒、道友、男女老幼、識字或不識字都趕快來學，這樣以後你們就會讀報以及其他的書和聖經，希望你們習道愈深，德性愈完備。」

⑦

自創刊號起的前幾期，連續刊出五篇從各地牧師、信徒應徵用白話字所寫的討論「白話字的利益」的得獎文章。得獎者廈門三名、府城一名、小溪一名。他們一致的結論是用白話字來傳教比用漢字優秀。沒有白話字，讀得懂聖經的信徒必然會減少。

萬榮華說：

「本來宣教師之間也有反對用羅馬字寫台灣話的，巴克禮博士獨排衆議，堅決主張並實踐教會的羅馬字教育。今天台灣的信徒宗教上、道德上的覺醒，不

能不說是巴克禮博士羅馬字教育之所賜。

「請比較中國大陸不用羅馬字的基督教教會看看，台灣的信徒不是進步太多了嗎？這是巴克禮博士最喜歡用來反駁輕視羅馬字教育者的話。」⑧

巴克禮提倡羅馬字教育的業績可能早就流傳於外國。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日軍登陸台灣，10月26日巴克禮開城迎日軍的事前面已經提過。應該是27日，後來擔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隨著樺山總督進了台南城，求見巴克禮。巴克禮原本是劉永福的同情者，他以為伊澤是特務，因此拒絕會談。伊澤說：「牧師的教育事業我們在日本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是親身來求教的。」巴克禮才答應會談。

兩人談到今後台灣教育語言的問題，伊澤認為台灣既歸日本統治就應用日語教學，但巴克禮期期以為不可。他說：

「用日本話來教育台灣人不是上策。長老教會最初也用英語教育，但是太困難了。不僅如此，好不容易排除萬難教出來的學生，剛懂得說一點英語，就討厭起宗教及教育方面的事，去從事世俗的茶商夥計或通譯去了。因此我們充份認識到用英語教育的困難。於是宣教師決定學台灣話、用台灣話來講道、教育。初抵台灣的宣教師先讓他們學習一年半載的台灣話再去講道。

「還有，台灣人的教育，用漢字來教台灣話十分困難，我們用羅馬字編教科書，教羅馬字寫的台灣話。所以我認為用日本話搞台灣人的教育不會成功，並且最好用羅馬字寫台灣話文教育台灣人。」⑨

但是伊澤仍堅持採用日本語，說：「實驗兩三年，你便知道我的意見是好是壞了。」

伊澤的教育方針有一個強烈的目的就是
要同化台灣人爲日本人,因此當然無法接受
巴克禮用羅馬字台灣話文教育台灣人的主張
了。並且伊澤本人也是一個漢學家,他曾著
有《日清字音鑑》,他確信中日同文,用漢字
教育台灣人必會成功。

儘管如此,伊澤擔任學務部長,甫上任
(明治二十九年,1896)即下令神津仙三郎編
纂日台對照辭典,後來由小川尙義接手完成
《日台小字典》(1898)、《日台大辭典》
(1907)、《台日大辭典》(1931-1932),並在
1913年以前以日語、台語對譯的方式教日語
⑩,我想這一連串的政策多少也受到巴克禮
的啓示吧。這些辭典、教材採用總督府設計
的假名符號注漢字音,而不是羅馬字。但是
實驗結果相當成功。伊澤不久辭去學務部長
職,明治四十一年(1908)來台參加鐵路開通
典禮時順道訪問巴克禮,不巧巴克禮返英休
假而不遇。伊澤交待一名叫細川的人說:「等
巴克禮牧師回來,問他:國語(日語)教育收
到輝煌的成果,他有什麼意見沒有?」到底
細川有沒有去問巴克禮,文獻不足徵,不得
而知。

1931年巴克禮在廈門譯成舊約聖經回
到台南之後,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國府種武教
授,爲了寫《國語教育在台灣之展開》一書,
走訪巴克禮,向巴克禮請教「對台灣人子弟
進行國語(日語)教育」的看法。巴克禮回答
說:

「我不能不承認國語(日語)教育的成
績,不過我仍然不能放棄以羅馬字台灣
話進行教育效果最佳的想法。」⑪

對於這個回答,國府種武認爲巴克禮是
老頑固,「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巴克禮過去認
爲用日語教育必歸失敗,而今却不得不承認
用日語教育的成績。如果伊澤知道這一席話
一定是十分高興吧。只可惜巴克禮當時已經

不記得1895年和伊澤修二見面的事。」⑫

持平言之,巴克禮的堅持自有其道理,
所謂「國語教育成功」恐怕只是日本殖民地
教育家的自我陶醉。如果從同化政策的眼光
來看,日本治台37年之後的1932年台灣日
語普及率才達21.7%⑬,「教台灣人學講日
語」的成績可說平平而已,若從台灣人教育
的立場,「用日語教育台灣人」那更無何成績
可言。巴克禮的本意大概如此,這一點恐怕
不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家所能理解的吧!

總而言之,巴克禮一生中在台灣提倡教
會羅馬字教育,不但在教會實踐,並且獨力
完成《廈英大辭典補編》、廈譯《新約》、《舊
約》全書,其功績可謂彪炳了。

3. 從杜嘉德到巴克禮 的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

西方傳教士爲了傳教的目的,無不運用
其語言學基本常識對當地語言進行研究。不
過他們多半沒有經過良好的語言學訓練,並
且現代語言學在當時還不是很發達,所以西
方傳教士的研究著重在實用的目的,而非理
論分析。而其研究結晶可以說是字典的編
輯,即詞彙的蒐集。

1973年《廈英大辭典》出版,杜嘉德以
當時優秀的語音學基礎,對前人的研究做
了一個集大成。

但杜嘉德字典出版之後仍有許多字典陸
續問世。這些字典,除了少數和杜典同時出
版者之外,差不多都參考了《廈英大辭典》,
對杜嘉德相當尊敬。茲簡介如下:

1. Williams, Samuel Wells(衛三畏)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Pronun-
ciation of Peking, Canton, Amoy,
Shanghai" (漢英韻府)

1874 年上海長老教會出版。1254 頁。

這本書出版年代遲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只有一年，所以無論標音方式和內容都與杜嘉德辭典相當不同，廈門音在本辭典中只佔一部份。

2. De Grijns, C.F. M. (赫萊斯) en Francken, J.J.C. (佛蘭根)

“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ct” (廈荷大辭典)

1882 年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巴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 出版。774 頁。

3. Schlegel, Gustave (施萊格)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 (荷華文語類參)。

1882-1890 年 Leiden: E.J. Brill 出版。正文 5,217 頁，序 27 頁。四大冊。

以上一本廈荷辭典，一本荷漳文言辭典為兩位荷蘭通譯所做。他們都是 J.J. Hoffmann 教授的學生，1857 年以通譯見習生奉派到中國習漢語，不久派為荷屬印尼的正式通譯。他們選擇了印尼最通行的閩南語做為研究對象。當時印尼華僑有三十萬，荷蘭人必須學習閩南語才能和華僑溝通。他們的公文也必須譯為漢文才能使華僑理解。

於是他們奉派到閩南研究閩南話。J.J. Francken 負責研究編纂閩南語白話對荷蘭文辭典，Gustave Schlegel 負責研究編纂荷蘭文對閩南語漢文辭典。

1862 年他們回到爪哇。那時他們所蒐集的資料已達相當的數量。不幸的是《廈荷大辭典》的編者於 1863 年去世。他去世之後，巴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決定委請 C.F. De Grijns 整理他的遺稿出版。可是巴答維亞只有一家印刷廠能夠印漢字文書，一本字典排了 18 年，1882 年才遲遲出版。那時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已搶先在 1873 年出版，這本《廈荷大辭典》遂失其意義。

1872 年 Schlegel 奉派回國，在萊登大學教書，他利用業餘時間完成了四大冊的《荷華文語類參》。第一冊 1470 頁，1886 年出版；第二冊 1132 頁，1887 年出版；第三冊正文 1212 頁(附 1882 年序 27 頁)，1884 年出版，第四冊 1403 頁，1890 年出版，全書正文共 5217 頁，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閩南語辭典。前後共排印九年。由第三冊先出版，也是奇怪的事。此書所收全為文語，是著眼於將荷蘭文書譯為漢文的目的。例句用漳州文讀音逐字注音，偶爾加注白讀。

Schlegel 在閩南期間和杜嘉德那一批牧師曾互相協調音標問題，因此雙方的音標大體一致。但有少數地方協調失敗，最重要的差別是杜嘉德堅持分別用 ch 和 ts 表「曾」字頭，Schlegel 只用 ts；杜嘉德用 eng 表十五音的「經」字母，Schlegel 用 ing。Schlegel 在序中批評杜嘉德的方案，認為 ch、eng 不合閩南語音值，ch/ts 沒有音位的分別，不必分為二個符號，那是主要的錯誤 (the principal fault)。(14)

4. Macgowan, John (麥嘉湖)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英廈辭典)

1883 年 London: Trüber & Co 出版，611 頁。

John Macgowan 漢名麥嘉湖，或譯為

馬約翰。英國倫敦傳道會牧師。1860年來華，先抵上海，1863年轉廈門。1871年編廈門話教科書《英華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這本書後來於日本領台之初譯為日文本《日台會話大成》。1882-1890年Schlegel的《荷華文語類參》是第一本外文譯為閩南語的字典，可惜只收文語，麥嘉湖《英廈辭典》目的在於傳教之便，故多收口語辭彙。

本書所用音標近於杜嘉德，其選用漢字不太講究，多訓用字。為分別文、白借字，於白話音之漢字右上角記一“。”號，借用字用“8”號以為區別。是其特色。

5. Mackay, George Leslie(偕叡理，通稱為馬偕)1891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中西字典)。

1891年台北耶穌聖教會出版。正文226頁。

著者偕叡理，1844年3月21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省牛津(Oxford)左拉(Zorra)村。幼年受英國長老會第一位海外開教宣教師賓威廉(William C. Burns)感召，立志當傳教士。多倫多大學畢業後，入洛士神學院。1867年轉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1870年畢業，立即向加拿大長老教會申請海外宣教，以該會無前例可循，未獲答應，乃轉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就教於Dr. Alexander Duff學宣教學。1871年獲加拿大長老教總會海外宣教聖職。1871年10月19日離開加拿大，經美國、日本、香港、廣州、汕頭，12月30日抵打狗，在李庥牧師門下為客，學台灣話。1872年抵淡水設教。初時受到民衆很大迫害。11個月之後即有5名信徒



偕叡理牧師遺像

受洗。1873年3月2日在五股坑設第一所教堂。

馬偕在北台灣進行醫療傳道，1874年華雅各醫師(J. B. Fraser, M.D.)來淡水共事。

1880年美國底特律馬偕夫人為紀念先夫馬偕船長，捐款在台設馬偕醫院(Mackay Mission Hospital)。

1880年與台灣女子結婚，同年偕夫人一起回加拿大渡假，募款6,215元美金。1881年11月30日返台，1882年6月19日創Oxford College(漢名「理學堂大書院」)以紀念故鄉捐款人。該校即為後來「台灣神學院」及淡水學園前身。1901年6月2日逝世於淡水。

偕牧師初抵台灣時，為熟練台語，迴避會說英語的人，專與農民、牧童交遊，每日達五、六小時之久，並記下新聽到的字彙^⑮。夜裏研習漢文，大聲朗讀背誦。不到五個月便能以台灣話傳道。

偕牧師學習台語的副產品即這本「中西字典」，依序言說，1874年偕牧師得到上海美華書館的一本漢字表，名“Lis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onts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共收6,664字。他便以此字表向僕人、門徒請教台語發音，並記下意思，刪去台語、聖經不用的字，並增入有用的字，共得9,451字。1875年得到衛三畏的《漢英韻府》(1874)，據以逐字校正音義。1876年完成初稿。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淡水被炮擊，燒掉一部份。乃派門徒連和、劉澄清編列漢字、汪式金抄寫、嚴彰以羅馬字逐字注音及譯義。1889年8月10日由陳榮輝、連和、葉順、洪胡校正完畢。1891年派嚴彰、蔡生往上海美華書館監印。三個月後

印畢返淡水^{①6}。

《中西字典》在台灣編纂完成，故英文書名為“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是第一本以羅馬字台灣話釋義的閩南語字典。但其發音仍是廈門音，不是淡水的同安腔。從其體例可以窺知本書只為認識漢字之用，注音及注釋都極為簡單。

6. Talmage, John Van Nest(打馬字
1819-1892)

“Ē-m̄ng-im ê Jī-tián” (廈門音个字典) 1894年鼓浪嶼萃經堂出版，469頁。



打馬字牧師遺像

打馬字屬美國荷蘭歸正教會。1819年8月18日生，1842年8月19日Rutgers College畢業，1845年New Brunswick神學院畢業，1846年按牧，1847年奉美國ABCFM派抵廈門傳教。1892年8月19日死於廈門。共在廈門傳教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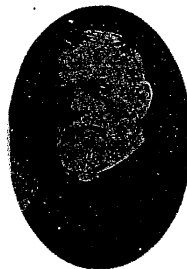
1852年打馬字在廈門刊《唐話番字初學》(Amoy Spelling Book)教導羅馬字拼音。並翻譯了許多篇《新約》，如：路得書、路加福音傳、約翰書、羅馬書……等。

《廈門音个字典》出版是他死後二年的事。短序的作者Lâi bok-su即Rev. Daniel Rapalje，漢名來坦覆，他也是美國歸正教會牧師，1858年抵廈門傳教。據序言說，打馬字編此字典的目的，是要幫助信主的人去認漢字，因為漢字需逐字跟先生學讀，很久才會，若有一本字典可查，只要懂得羅馬拼音就懂得漢字讀音。因此他為本地人製作了這本字典全用廈門話解釋，共收6,378字。這是第二本用閩南語解釋的閩南語字典。

7. Campbell, William(甘為霖)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Taiwan)” (廈門音新字典)

1913年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正文814頁。



甘為霖牧師遺像

甘為霖英國長老教會駐台第二任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由廈門抵打狗。翌日抵安平，居府城。他精力充沛，學習力強，來台二年即可對各種人以台語講道。他著作等身，如《新港語馬太福音傳》(1888)、《台灣佈教之成功》(1889)、《法波蘭語信仰個條書》(1896)、《中國的盲人》(1897)、《荷蘭治下的台灣》(1903)、《廈門音新字典》(1913)、《台灣素描》(1915)……，他是荷蘭時代台灣史學的開拓者、語言學者、佈道家、台灣盲人教育的開山祖師。1915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授與他榮譽博士學位，以表揚他的功勞。1917年春退休離台。總計在台工作四十五年。

甘為霖編纂《廈門音新字典》曾得到兩位得力助手，即林錦生與陳大鑼的幫助。林錦生(1894-1980)台南人。1907年台南新樓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前身)畢業即受聘助甘為霖編字典，負責抄錄詞條，蒐集同音字、俗字，工作近二年辭職。後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習醫，1976年左右著《七十年前之回憶》，附題：〈廈門音新字典與我〉，對《廈門音新字典》的編纂過程記載甚詳。林錦生辭職後，由1910年長老中學畢業的陳大鑼繼任助理。共事三年，負責完成解義、整編及

校正。陳大鑼(1893-1983)永康人，漢學基礎甚佳，又曾協助戴仁壽醫生著《內外科看護學》(白話字台灣話文 1917)，及劉青雲著《羅華統一書翰文》(白話字注廈門音 1925)。

據甘爲霖字典序及《七十年前之回憶》，這本字典收字 15,000 字。漢字參考了《康熙字典》，俗字參考《十五音》，另外參考了馬禮遜、麥都思、衛三畏、Gile、打馬字、偕叡理、Couveur 神父、麥嘉湖、Hare 的著作。

這本字典在編法上酷似打馬字的《廈門音个字典》(1894)。都以廈門話白話字爲漢字注音及簡釋字義，是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以閩南語注釋的閩南語字典。林錦生記載說：「甘典是以打馬字字典爲基礎增訂的」。不同的是，甘典收字增加了一倍多，並以字首大小寫分別文讀與白讀。林錦生又說他「曾搜集了一些台灣流行的日本字，及民間創作的俗字請甘氏收入，但未爲甘氏所用」^⑪。但康熙字典中大量冷僻的漢字却爲甘爲霖所收入。可見甘爲霖編纂態度的保守。據他序上說，本書著作的目的是要「教人認識更多漢字」，並不是替台灣話找漢字或創新字，所以社會上不通行的字便不在他的蒐集之列了。

甘爲霖一生在台灣傳教，這本字典也是在台灣編的，但他却没有把台灣音反映在他的字典上，而堅決支持長老教自來以廈門音爲標準的傳統。他認爲這是「需要、有益、教會弟兄的常識」，他在序中嚴厲排斥教會中有人修改了 1873 年以來聖經(按指馬雅各在 Glasgow 監印出版的《新約》)所用的拼法和發音。譬如有人把 tsa 改爲 cha，又有人把 cheng 改爲 tseng(兩者都爲了反對 ch/ts 的對立標示法)，把 biat 改爲 biet；又方言上台南音受到漳州音更大影響，譬如「姊妹」chí-moāi/moē，「月」go^hēh，「銀」gîn，「血」hoeh，「家自」ka-tī……都是漳州音，甘爲

霖認爲應該採用聖經所使用的廈門標準音 chí-bē、gēh、gîn、huih、ka-kī……至於口語要讀成其他的方音可以悉聽尊便。他稱那些台灣口音的拼法是「未被批准的變體」(unsanctioned alternation)。換言之，在他心目中，1873 年聖經所寫定的廈門音儼然已經是所有閩南語的正式文字，不容更改了。正如英文正字法不容更改一樣。

從品質上來說，甘典不是一本很好的字典，但因爲它收字很多，符合國人以羅馬字注漢字音的需求，因而成爲所有字典中最普及的一種。至 1984 年 4 月已印了 13 版，除了十五音之類的傳統韻書，沒有一本羅馬字字典受到這樣的歡迎^⑫。

4. 巴克禮《補編》的意義

巴克禮在《廈英大辭典補編》前言中，盛讚杜嘉德 1873 年所出版的《廈英大辭典》是一部「完整且精確的學術著作。半世紀以來已嘉惠學此語言的所有學生」。

但是歷經五十年之後，「中國發生了鉅變，西方文明廣受歡迎，在思想、行爲的各方面，各種新觀念瀰漫民心。這些新觀念產生了新詞彙，豐富和拓展了語言。」於是杜典遂越來越令人感到詞彙不夠，不足以指導學生了。

在出版《補編》(1923)的十年前，即 1913 年，台廈地區基督教傳教士請巴克禮重譯《新約》的同時，也請巴克禮替杜典作《補編》。

巴克禮舉例說明《補編》如何補充杜典說：

「『校』hāu 現在是很常用的字，却不見於杜典；五十年前『會』hōe 是一種禁忌，會被當局所疑，在杜典中只收二十個詞，但在《補編》中這樣的詞却佔了一頁。『電』tiēn 字在《補編》中超過一百詞，而在杜典中却只有二個，而且

與電氣無關。」

杜嘉德著《廈英大辭典》(1873)時，電學尚在萌芽，電燈尚未發明。1908年巴克禮返歐，經過巴黎時才第一次看到電燈，1923年出版《補編》時，台灣的電氣化已相當普遍了。杜典中「電」字只收「電母」、「雷公電母」兩個古詞條。巴典中不收這兩個古詞條，却收了113個大部份與電氣有關的新名詞，如電報、電信、電匯、電報爲替……電話、自動電話……電燈、電火、電柱……電塗、電池……電金……絕大多數是來自日語的新名詞，其中大部份被現代中文吸收，現代台語仍使用，有些中文未吸收的，如電報爲替(電匯)、電話交換手等即隨著日本時代結束而廢用，有些台灣獨特的俗語如稱電報爲「電線批」，打無線電報叫「扑飛電」，亦流失。仍然保存的非中文辭彙僅屬少數。

完整的白話辭典是民間文化的紀錄，由杜典到巴典及台日大辭典以至今日尚待編輯的台語現代辭典可以說代表著閩南語發展爲現代台語的各代文化史冊。從這個觀點來看巴典，便知道巴克禮在歷史上佔著多麼崇高的地位。比起只爲漢字注音的偕叡理《中西字典》、甘爲霖《廈門音新字典》，自然是不同凡響了。

杜典所不收的，巴典增補的字，在字頭上加*號。那些加了*號的字，不全是杜嘉德疏忽未收，大部份是當時口語所不用，如價值的「價」kà；階級的「階」kai；諷刺的「諷」hōng；俘虜的「俘」hu，芎蕉飴的「飴」î；要求的「要」iau；擁護人權的「擁」iōng……這些漢字都原有閩南語讀音，但不用於白話，所以杜典不收，近代以來受到日語、中文的影響，口語採用做爲新詞素，巴典才收入。另外有些新字，如：碘質的「碘」tién；「鈳」(即今矽字)sek；「銻」(今作銻)lō；「燐」lín……當然杜典不可能收入，巴典作

了增補。總而言之，巴典反映了一九二〇年代的閩南，尤其是台灣新文化的詞彙系統。

儘管如此，巴典對於一些已經過時的詞彙，如和前清科舉制度有關的詞彙仍然儘量補充。他認爲這類詞彙雖然已經沒有實用的價值，但仍然是語言的一部份，可以做爲過去事物的一種留念。

杜典和巴典都是一種口語詞典，他們製作的目的是蒐集口語中出現的詞素，而以例舉辭彙的方式讓使用者了解詞素的意義。因此辭彙組成的例句、格言、俚諺，巴典和杜典都很少收入。巴克禮希望編一本“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片語及寓言辭典)但沒有實現。

巴克禮曾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成員們分別注意各個領域，如醫學、神學、科學、哲學或日常生活的語彙，其中一人擔任總校對，每一個人身邊都要有個台灣人學者當顧問，編纂完整的閩南語辭典。然而以教會的力量，顯然不可能做到。事實上，當巴克禮做此建議的同時，台灣總督府已經運用政府的力量進行了很久，巴典出版之後，一部偉大的《台日大辭典》再過十年(1932-33)就出版了。

巴克禮在序中提到兩位幫助編輯《補編》的人。一位是梅監霧(Rev. Campbell N. Moody of Shoka)，台灣中部長老教會設教功臣，他曾把四百餘頁的辭典手稿交給巴克禮使用；一位是剛由日本留學歸來的楊士養，他懂中文、日文、英文，也許他才是巴克禮最得力的助手。

註釋

①據井川(1936)〈鄉國に於けるバアクレイ博士〉，P.28。巴克禮所發表的論文題目是〈電導體的誘電量比及其相應於溫度量的變化〉。

②參照昭和九年八月卅一日ジাপンタイムス輕

井澤通信<バアクレイ博士の乃木將軍>，巴克禮手記<乃木將軍の台南入城>，收入井川(1936) P.129-140。

③參見賴永祥〈巴克禮增補杜辭典〉，1988.8.28，
《台灣教會公報》1904期。收入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P.90。

④參見巴克禮〈八十六歲で新舊約聖書翻譯〉，據井川(1936)日譯，P.76-85。

⑤萬榮華〈十七歲で獻身した博士〉，據井川(1936) P.166轉譯。

⑥“Barklay of Formosa” P.67。引自賴永祥(1990) P.59。

⑦見《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詞，1885年7月第一期。

⑧昭和十年12月萬榮華演講〈十七歲で獻身した博士〉，井川(1936) P.166。

⑨引自國府種武〈トマス・バアクレイ師と國語教授〉，原載台灣教育401號，收入井川(1936) P.64-74。

⑩參見拙著《日據時代的台語辭書編纂》，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部。

⑪同9，P.72。

⑫同9。

⑬見村上嘉英(1966) P.86，資料引自「台灣事情，昭和十八年版」131-2頁。

⑭以上有關施萊格、佛蘭根、赫萊斯等人編輯字典的過程參見施萊格《荷華文語類參》的序言(第三冊)。關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可參見包樂史的《中荷交往史》，茲將有關三人的傳記資料(P.128-132)引述如下，敬請參考：

1853年，荷印總督戴瑪爾·范·特威思特(A. J. Duymaer van Twist)向荷蘭殖民大臣巴胡德(C. F. Pahud)提出申請，要求政府考慮培養幾位荷蘭人成為中文通事。他認為，“既然巴城政府已經知道荷印華人的不軌行為，”那麼對中文通事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當巴胡德大臣着手調查于萊頓建立這種一個培訓中心的可能性時，驚異得知住在萊頓的荷印政府的日文翻譯霍夫曼(J. J. Hoffmann)已經卓有成效地培養着一位十三歲的荷蘭少年施萊格(Gustave Schlegel，一譯施力

赫)，他給這位荷蘭少年講授古代漢語閱讀課已有一、二年之久。霍夫曼堅信，通過繼續學習，到施萊格成年時，他將成為一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學者。因此，政府正式要求他繼續講授這門課程，並增加兩、三名荷蘭學生。不久後，施萊格的兩位同齡人弗蘭根(J. J. C. Francken)和斯哈爾遮(M. Schaalje)及軍隊藥劑師德·赫萊斯(de Grijs)也開始學習中文課程。由於缺乏高質量的詞典和語法書籍，學習中文相當吃力。1857年，霍夫曼宣稱，他的學生已修完他所教授的中國文言文基本知識，現在應該送他們到廈門去進一步深造了，他們在廈門可學好荷印地區大部分華人使用的閩南方言的口語。1862年，也即在中國留學四年之後，這些學生的學習始告成功，他們帶着學識與經驗前往巴達維亞，擔任通事。

施萊格並未辜負其恩師霍夫曼的厚望。他出版了幾部卓越的研究著作，其中，《天地會：中國與荷屬東印度的秘密會社》(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一書最為著名。這本開拓性的著作於1866年初版以後，又多次再版。此書披露和分析華人秘密會社的禮儀制度，因此，荷印當局能採取相應措施對付華人黑社會。1872年，施萊格因病假回到荷蘭後，立刻拜訪其恩師霍夫曼，談論關於中文教育問題。霍夫曼此時已擔任日本語言文學教授，他勸施萊格向荷蘭殖民部建議，改善華文通事的培養教育條件。他認為施萊格可以接替他講授中文課程。在一份“關於急需在荷蘭建立中文學校的報告”中，施萊格強調了建立這個機構的重要性。所需要的漢學教授不僅應培養翻譯人才，而且要為未來的東印度官員講授關於華人風俗習慣的基礎課程。他認為，“荷印華人之所以發生多次暴力反抗和騷動，僅應歸咎於荷印官員不了解他們的民族性格。”他也強調必須着手編輯高質量的荷漢和漢荷辭典各一本。已故的學者佛蘭根所編的漢荷辭典的手稿已經完成了，施萊格也順便提及他已“耗時十五年編輯的荷漢辭典也已大部分脫稿。”在殖民部的資助下，施

萊格得以將這本書付梓，由擁有歐洲第一套能印漢字的設備的萊頓布理爾(Brill)出版社出版。施萊格在報告中宣稱：“既然荷蘭人以前認為需要設置一名日文教授，現在就更應設置一名漢學教授。荷蘭與日本僅有貿易方面的關係，而荷蘭的殖民地却生活着二十萬中國臣民，他們的利益與我們密切相關。華人為荷印政府的財政收入、工業、貿易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1875年，施萊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教授職位，1882-1892年間，他編纂的《荷華文語類參》(荷漢辭典)四卷陸續出版問世。這部巨著受到國外學者的極高評價，特別是因為這本辭典中，可明瞭地查閱閩南話的語音。然而，令施萊格遺憾的是，這部辭典僅在荷屬東印度翻譯人員的有限範圍內中使用。

萊頓中文學校的課程設置主要是為了研究荷屬東印度的華人和他們的祖居地中國南方，特別是福建省。施萊格接任教授時，宣稱以此為己任。施萊格擔任教授期間(1875-1903)，共培養二十五名中文翻譯，他們的科研成果幾乎僅局限于南中國及其對東南亞擴張的研究。主要研究專題是：對華人移民相當重要的喪葬組織(這種組織對重視祖先崇拜的移民集團特別重要)，秘密會社(對華人礦工特別重要)、勞動協會組織“公司”、華人移民社會的勞動狀況與權力關係等等。最后是關於華人風俗習慣(偏重於禮儀制度)的研究，施萊格最有才華的高足高羅特(J. J. M. de Groot，一譯高延)對這個題目進行深入的探索。1903年施萊格去世，高羅特接任其教授職位。

- ⑮參照賴永祥〈學習當地語言的土方法〉，原載1988.7.3《台灣教會公報》1896期，收入賴(1990) P.65。
- ⑯參見賴永祥〈馬偕「中西字典」〉，賴(1990) P.67。
- ⑰參見賴永祥〈俗語字在甘字典〉，賴(1990) P.177。
- ⑱按沈富進1954年初版的《彙音寶鑑》，1984年2月即印了第29版，顯然比甘典更受歡迎。

參考書目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廈英大辭典)1873, London: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Williams, Samuel Wells(衛三畏)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Peking, Canton, Amoy, Shanghai” (漢英韻府)1874, 上海長老教會出版。

Francken, J.J.C en De Grijs

“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ct” (廈荷辭典)1882,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巴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出版。

Schlegel, Gustave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 (荷華文語類參)1882-1890, Leiden: E.J. Brill出版。

Macgowan, John(麥嘉湖)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英廈大辭典)1883, London: Truber & Co.

Mackay, George Leslie(偕叡理，通稱馬偕)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 (中西字典)1891，台北耶穌聖教會出版。

Talmage, John Van Nest(打馬字)

“Ē-m̄ng-im ê Ji-tián” (廈門音个字典)1894，廈門鼓浪嶼：萃經堂出版。

William, Campbell(甘為霖)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Tai-

wan)”(廈門音新字典)1913。

Barclay, Tomas(巴克禮)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Rev. Carstairs Douglas, M.A.L.L. D]”(廈英大辭典補編)
1923年，台南：英國長老教會出版

井川直衛編

《バークレイ博士の面影》1936，台南：基督教真理社出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1965，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

吳守禮

〈台灣ローマ字とキリスト教〉1944《民族台灣》4.1

《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語言篇》1970，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村上嘉英

〈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1966《日本文化》45:62-108

〈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異民族傳道と言語の問題〉1966，《日本文化》44:52-72。

〈白話字の變遷と閩南語譯聖書〉1971，《日本文化》49:96-118。

賴永祥

《教會史話》第一輯，1990 人光出版社。

國分直一

〈ウイリヤムキャンバル師〉

〈トーマス・パークレイ師〉

二篇均收入《壺を祀る村——台灣民俗誌》

1981・日本法政大學出版局。

Band, Edward

“Barclay of Formosa”

東京：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包樂史(L. Blussé)原著 莊國土、程紹剛譯

《中荷交往史》(1601-1989)1989，(廈門?)：路口店出版社